# 导　论

## 一、研究目的

国防经济非均衡首先是一个实践命题。

用“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瞻之在左，忽焉在右”来描述国防经济的巨大变动性或非确定性是十分贴切的，产生国防经济非均衡的根据亦深深地隐含在这种巨大变动性和非确定性之中。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在战争状态下还是在和平时期里，各国都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如何正确地把握社会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在社会总资源中合理地进行国防分割、如何保持国防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大体均衡、如何建立适合国防经济均衡发展的相关制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决定了国防经济，特别是国防供需关系不可能完全和长期地处于均衡状态之中——非均衡是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间里国防经济供需关系的惯常形态。虽然在某些情况下非均衡是必要的和合理的（我们称之为良性非均衡），但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国防经济过度非均衡（或不良非均衡）给一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的重大损失甚至是重大灾难亦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国防经济在实践中也同样存在着非均衡。一方面，在建国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外部因素的强烈拉动和高层决策者的主观选择，我国国防经济以强制非均衡方式迅速发展，并在较短时间里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国防经济体系（在此意义上，我国所主动实施的国防经济非均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主观判断失误和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国防经济也发生过程度不同的不良非均衡，并由此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造成了负面影响。特别是由国防经济非均衡积累下来的各类矛盾直接构成了当前和今后国防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障碍。实践呼唤最大限度地克服国防经济非均衡！

国防经济非均衡也是一个理论命题。

在理论形态上，经济学和国防经济学还没有专门就国防经济非均衡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现有理论尚不能圆满地、确切地对国防经济非均衡，特别是社会主义国防经济非均衡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加以说明，以至于在国防经济实际运行中还缺少相关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规范。特别是我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对传统体制下的国防经济非均衡没有予以较为透彻的理论剖析和缺乏科学指导，致使新时期的国防经济变革过程呈现出过多的曲折，并生发出诸多新的非均衡现象，进而迟滞和延缓了国防经济改革的步伐与进程。

鉴于此，本文以下列之点作为研究目的：（1）对国防经济非均衡进行一般考察，以建立国防经济非均衡的基本

概念；对导致国防经济非均衡的主要因素和非均衡的基本类型进行初步的探讨；(2) 对社会主义国防经济实践中的特殊规律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以揭示我国国防经济非均衡的深层次原因，尤其是体制原因；(3) 通过对国防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原则性的思考，在理论上寻找能够有效地调节和控制非均衡的国防经济机制，并提出缓解和克服我国国防经济非均衡的总体设想和主要政策选择，以期为我国国防经济改革和实际运行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二、研究的学术渊源

经济学和国防经济学所提供的部分相关理论素材，以及非均衡学派所提供的方法论基础是本文研究的两大学术来源。

1. 经济学和国防经济学对国防经济非均衡问题的初步涉猎

在理论形态上，经济学和国防经济学是在对战争经济的研究中触及到均衡（非均衡）问题的。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①]中、庇古在《战争经济学》中、凯恩斯在《如何筹措战费》中都集中地论述了如何解决战争需要与国家物质力量之间的矛盾关系，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战争时期出现国防经济非均衡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可以认为，这是对特定的战争状态下，国家宏观经济均衡（非均衡）问题的初步涉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几十年的冷战和冷战后时

期，国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由战时转向对冷战和和平时期的国防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部分学者在他们相关的国防经济理论著述中，从不同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上研究了和平时期国防经济非均衡问题。如希奇和麦基因所著的《核时代国防经济学》、甘斯勒的《经济有效的国防建设》、《美国国防工业转轨》[②]，等等。特别是我国部分国防经济学学者，也开始对我国的国防经济建设非均衡问题给予了关注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如蒋宝祺教授等的《中国国防经济宏观分析》[③]、万东铖教授的《军事经济资源有效配置研究》[④]、游潜之教授的《中国国防经济运行分析》[⑤]等，都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2. 非均衡学派所提供的方法论基础

在凯恩斯经济学出现之前，经济学研究是以均衡方法为主的。

第一个系统地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均衡机制的人，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成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均衡性的最为经典和最为通用的理论工具。但是，将均衡概念移植于经济学的先驱，当属西方洛桑学派的创始人瓦尔拉斯。1874 年，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以均衡概念为基石，借助数学分析方法，建立了影响几代经济学家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其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瓦尔拉斯均衡[⑥]成为西方学者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协调运行的基本依据。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循着瓦尔拉斯的思路进一

扩展和建立了均衡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一方面，瓦尔拉斯均衡成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恒常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之一，另一方面，它也给经济学带来了一种独特的观察角度和研究方法。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也没有离开均衡分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描述了市场价格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的状况，指出价值规律对市场均衡运行的作用。他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十分详尽地论证了社会两大部类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比例均衡问题。但是，与前述均衡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在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具有自动恢复均衡功能的同时，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本身所隐含着的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平衡条件的破坏机制，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生巨大紊乱的过程。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长期稳定性，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的均衡性，进而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总体趋势。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亦具有十分突出的非均衡色彩。

1936 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对满足瓦尔拉斯定理的一组均衡价格的非现实性作了充分的论述，指出在现实经济过程中，由于价格具有刚性，因而它不可能有效调节经济，并使其达到均衡，从而提出“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凯恩斯把瓦尔拉斯均衡看做经济运行过程的特例，意欲创立更具一般性质的均衡理论。他说“经典学派经济学家，正好像是欧氏几何学家，生活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非欧世界里。当他们发现，在日常经验中，两条看来是平行的直线会相交时，他们尽抱怨为什么直线不直走。在他们看来，直线直走乃是避免两线不幸发生冲撞之唯一办法。然而，除了放弃平行公理，另行创造非欧几何外，实在别无补救办法。今日之经济学也需要如此改造一下……”⑦他认为，经济行为人在做出决策时，不仅要考虑传统的价格信号，而且也要考虑数量约束信号，并且主要是通过数量的变动使得每个市场的供求达到均衡。瓦尔拉斯均衡是通过价格摸索而达到的均衡，而非瓦尔拉斯均衡则是通过数量摸索达到的均衡（也可称为配额均衡）。在此意义上，凯恩斯的非均衡仍属于广义均衡理论⑧。凯恩斯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创立，为经济学研究注入了更为接近于现实的研究方法。

我们将均衡与非均衡理论作进一步比较，可从中发现非均衡分析方法的若干理论要义以及它的“普适性”第一，均衡理论的前提性假设是相信市场具备足够的达成均衡的调节力量，即仅仅依靠单一的价格机制便可保持经济运行的恒常性均衡；非均衡理论的前提性假设则反是：认为经济运行的常态是非均衡的，它经常性地表现为在现有价格下的市场非出清状态。不同的理论前提，反映了两种理论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和研究思路之间的差异。对于经济运行的决策者、管理者和研究者而言，承认经济运行过程的非均衡性较之相信经济运行可恒常均衡更为符合实际和更具重要性。第二，由于均衡与非均衡“是对某种经济运行状

态的刻画，所以，一种经济是否能实现均衡，就会涉及到对这种经济所处的经济体制的评价”，[9]故而，均衡理论就暗含着对既有体制所具有的信心和肯定性评价，而非均衡理论却相反，它至少对现有体制具有不同程度的“不信任”，认为“市场非出清是一种现象状态，它的背后蕴含着现实经济条件与瓦尔拉斯的假定条件有着重要差异这一个判断”，因此，非均衡研究的任务是“探索市场非出清的体制原因。[10]部分非均衡理论则主张通过局部变革甚至是体制变革来改变经济运行中的非均衡状态。在社会主义国家，均衡与非均衡的争论“往往是与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评价紧密相联的。”[11]可以说，无论是均衡研究还是非均衡研究都表现出对体制因素的极大关注。第三，当均衡和非均衡研究脱离了单纯理论研究的形态之后，它们各自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同战略选择和政策选择的理论依据，从而由理论争论演变为战略选择争论和政策选择争论；由寻找导致非均衡的原因转变为研究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体制不变条件下的均衡一非均衡研究，转变为体制变革过程中的均衡一非均衡研究。在这种更为接近实践的研究过程中，非均衡方法因其更贴近现实和更具适用性而受到人们的关注。第四，非均衡理论较之均衡理论更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性质。非均衡的代表人物之一贝纳西（J. P. Benassy）曾说过，非均衡理论“是一种能应用于不同制度背景的非常一般的理论，既能应用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能应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当然，不同的制度将导

致所经历的非均衡性质的重大区别，但重要的是一般方法仍然是相同的。[12]

三、研究方法的特殊规定性

本文不能照搬西方非均衡理论体系，笔者甚至对“非均衡”概念本身的使用都与其原意有重大差别。如若将非均衡学说一成不变地套用于国防经济或中国国防经济分析，无疑是理论研究中的“玩忽职守”，其研究的最终价值甚至在研究之前已经不复存在。我认为，重要的是从国防经济的特殊规定性出发，把握非均衡理论对于我国国防经济研究的适用度，其中，尤以掌握非均衡的方法论为最。

非均衡理论运用于国防经济分析的困难之处，主要来自于非均衡理论的研究空间与国防经济研究空间的差异：从总体上说，非均衡理论产生背景和研究对象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及其经济运行，而即便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国防经济也仍然具有“政府经济”的性质，其运行的结果是生产“国家安全”这一“公共物品”，其主要运行过程是受政府和有关机构严格控制的。由此，便带来如下问题：（1）非均衡理论原本是针对均衡理论的单一价格均衡非现实性而创立的，但当它运用于国防经济运行时便同时具有了自身的“非现实性”，因为数量调节历来是国防经济运行中具有实际作用的通则，价格原本就不能在完全或真正的意义上成为国防经济的调节者，非均衡理论在国防经济分析中便由此而失去了理论的实际出发点。（2）一旦在国防经济领域运用非均衡分析，非瓦尔拉斯学派所指

出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提出的若干理论假设，就由“非现实性”变为具有“现实性”，因此就可能失去了进一步讨论的意义[13]。这一来，便打破了非瓦尔拉斯均衡原有的理论逻辑，其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尤其是国防经济运行中的许多特殊规律是不能用非均衡理论现有的成果来概括的。(3) 非均衡理论在中国国防经济分析中的运用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因为我国国防经济较之一般国防经济更具特殊性。比如，我国特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环境、高度集中的国防经济管理体制、迥异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取向，等等，都构成了中国国防经济运行特有的规定性。如果仅仅将非均衡理论简单地套用过来，非但无助于揭示其本质规律，反而使理论研究牵强附会和苍白无力。

但是，国防经济又与一般经济过程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因而，非均衡理论又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适用的。例如，国防经济运行过程也是一种资源投入与产出的过程；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均衡关系依然是其运行过程中的基本关系；在历史中，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时期的国防经济活动通常都表现出一种非均衡的状态；国防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将价格信号排除在外，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防经济体制的改革，价格在国防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强，运用价格、竞争、利润等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多，这种混合的经济调节正是非均衡理论研究的既定前提和现实环境。此外，就我国国防经济建设的实践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不断地促使

国防经济在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机制方面实现创新。可以预料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发展，国防经济将越来越多地与市场经济发生交流和融合。因此，与惟一地相信价格力量是不现实的一样，期图惟一地通过计划或数量调节解决国防经济运行均衡问题的设想也是行不通的。在此意义上，非均衡理论对国防经济研究的运用价值将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

非均衡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对于国防经济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防经济研究更为重要：第一，由均衡研究到非均衡研究的转变过程，是宏观经济研究由规范到实证的转变过程，因而也是理论研究由理想化状态转变得更为符合实际的过程，它为国防经济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长期以来，我国的许多理论研究较为侧重于规范，着重于阐述事物“应该是怎样的”，对于实证分析则还十分欠缺，因而不能有力地说明事物本来“是怎样的”和“为什么是这样的”。同样，国防经济研究既需要理论规范，也需要理论实证，尤其是对我国国防经济的体制成因等问题，目前还缺少具有实证分析性质的研究，运用非均衡的方法则有助于建立和发展这样一种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第二，非均衡理论的“否定思维”对国防经济运行研究具有启示。虽然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均衡与非均衡两大理论流派研究的共同着眼点，但均衡理论研究的目的大多在于寻找总供给与总需求中由非均衡到均衡的“可均衡性”因素；而非均衡理论研究的目的则侧重于寻找总供给与总需求由

均衡到非均衡，甚至是恒常非均衡的“不可均衡性”。后者研究的内容大多集中在非均衡的生成机理和克服非均衡状态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同样地，对于国防经济运行分析，重要的也在于发现导致非均衡的根本原因和寻找到克服非均衡的办法。第三，本世纪 30 年代以来，东西方经济学者关于非均衡的全部讨论，事实上都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在经济体制既定的前提下考察均衡实现问题；二是在经济体制变动条件下考察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14]。这就启发我们：在对国防经济运行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对体制因素给予更多的关注——它构成了本文最为主要的研究路径和一以贯之的分析方法。第四，非均衡理论的某些具体方法对于国防经济运行分析是十分有益的。例如，首先设立均衡模型，提出理想均衡模式，为由非均衡向均衡逼近提供“目标值”；注重对不同经济主体行为的实证分析，强调各类主体及他们的行为对于非均衡的作用；等等。

四、本文的逻辑构想与篇章安排

1. 逻辑构想及方法选择

首先，研究过程是从特殊到一般。本文自始至终贯彻着以下的意念：对我国国防经济非均衡现象予以理论上的“体制追问”。通过对建国后几十年国防经济运行状况的具体分析，本文抽象出不同时期中的“制度原因”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国防经济表现出“了国防需求与国防供给”的高度同一性[15]，正是这种“体制特性”导致了具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特殊性质的国防经济非均衡；在转轨时期，则主要是由于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两大系统之间的“体制摩擦”造成了国防经济非均衡。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通过制度变革克服国防经济非均衡的基本设想：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我国应该建立“需求主导型”的国防经济体制，以克服上述两种体制下的非均衡现象。

其次，本文的叙述过程则相反：是依从一般到特殊的顺序展开的，即从“一般分析”人手，讨论均衡一般与国防经济均衡一般、非均衡一般与国防经济非均衡一般的概念、基本类型和主要致因，目的在于建立一般非均衡（包括社会经济一般和国防经济一般）的基本范畴，尤其是要确立国防经济均衡的“理论值”，为“非均衡特殊”作理论准备；在进入“非均衡特殊”之后，本文将研究的视角集中在中国国防经济的基本状况、非均衡的外部原因和非均衡的体制成因上。其中，又将我国建国后的国防经济建设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传统体制下的国防经济与转轨时期的国防经济——进行分析。在对这两个阶段分析中，提炼出我国高度统制国防经济体制下的“非均衡特殊”；并从这一“非均衡特殊”出发，提出通过建立新型的国防经济体制，来改变传统体制下和转轨时期中的国防经济非均衡状况，以使我国的国防经济最大限度地保持均衡。

再次，本文在研究和叙述中坚持“理论实证”(Positive Study)与“理论规范”(Normative Study)相结合的方法。迄今为止，国防经济理论对传统体制和转轨时期的制度因

素还缺少“实证性”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前两篇中主要采用理论实证的方法，对国防经济和中国国防经济非均衡展开分析。尽管理论实证的推导过程和最终结论需要进一步经过“经验实证”予以证明或证伪，但较之单纯使用规范研究而言，理论实证是更为接近事实或事物本来面目的重要路径。在第三篇中，则主要采用理论规范。与大多数理论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相信两种方法的同等重要性：理论规范的方法与前述的理论实证方法是相辅相成的。理论实证为理论规范提供基础性问题和结论，理论规范则根据和运用理论实证的研究素材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

2. 本文的篇章结构

本文分三篇。导言，第一篇对国防经济均衡与非均衡的一般理论考察。其中，第一节提出国防经济均衡的一般概念及其在国防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国防经济均衡的理论模型与实践尺度；第二节则对国防经济非均衡的概念、主要类型和主要生成机理进行初步分析。第二篇是对中国国防经济非均衡理论实证分析。在这一篇中，首先对我国建国后国防经济非均衡进行一般描述，对其外部原因进行初步探讨（第一节）；在第二节中，则集中研究传统体制下国防经济各行为主体的扩张行为，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传统国防经济体制下的扩张非均衡状况；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中，从传统体制下国防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特殊规定性出发，研究两者间的各种非均衡状况，突出地指出“供求高度同一”国防经济体制的弊端；第五节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转轨时期中的非均衡现象予以分析，从中揭示“供求摩擦型”非均衡的体制原因。第三篇转入规范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防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构想：建立“需求主导型”国防经济体制，并对若干制度变革和政策选择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注释：

①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下),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第一章。

②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8 年中译本。

③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版。

④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

⑤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版。

⑥瓦尔拉斯均衡，主要是指在完整的市场机制和灵活的价格体系条件下，任何交易的实现都以均衡价格为前提。一旦供给和需求发生相对变化，出现数量缺口，迅速变化的价格又会随时将其加以调整。在这种条件下，市场总能及时地被结清，各经济主体能够在自己所希望的数量上进行生产和交换，不可能存在超额供给和超额需求，从而使整个经济系统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⑦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8 页。

⑧参见袁志刚：《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4～85 页。

⑨刘伟、平新乔：《经济体制改革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6 页。

⑩参见杨瑞龙：《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 章。

⑪参见杨瑞龙：《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7 页。

⑫贝纳西：《非市场均衡经济学》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 页。

⑬如：(1) 广义均衡假设；(2) 双重决策假设；(3) 价格刚性假设；(4) 收入约束假设；(5) 非均衡价格交换假设；(6) 数量调整假设；等等。

⑭参见刘伟、平新乔：《经济体制改革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98 页。

⑮国防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高度“同一性”不是指它们之间的“统一性”。统一性是事物的本来属性，是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通过对立而达成的一致。同一性则指排斥供求之间原来意义上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一味强调两者形式统一的状况。

# 第一篇

# 一般范式：国防经济均衡与非均衡

## 第一节　国防经济及国防经济均衡

非均衡是相对于均衡而言的。认识和研究国防经济非均衡首先要认识和研究国防经济均衡。本篇的任务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上探讨国防经济均衡的一般概念和基本模型，为国防经济非均衡研究作必要的理论准备。

### 一、国防经济及国防经济运行

#### 1. 国防经济

一般认为，国防经济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用以保障军事需求或国家安全的经济部门和经济活动及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的总称。”[①]可以看出，该定义主要是从国防经济的供给方出发来规范国防经济的。根据观察和研究问题的需要，我们还可从其他角度来规范国防经济概念本身。张振龙教授从国防经济的运行目的出发指出，国防经济是“指军事安全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而这种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具体包括军事生产和保卫生产。”[②]该定义较之前述定义

更具广义性，它在深层次上暗含着如下对本研究的适用性：第一，国防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总是由国防需求与国防供给双方共同参与的。第二，国防经济生产国家安全的活动是有层次的。它可以是涉及整个国家的行为，可以是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的具体生产与经营过程，也可以是军事单元的存在状态等。由于本文将集中地讨论国防经济均衡与非均衡现象，而均衡与非均衡的核心问题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因此，从上述定义出发，将国防经济活动视为满足国家国防安全而产生的国防总需求与总供给矛盾运动的过程。它不仅可以划分为不同层次，而且其具体构成应包括：第一以国防科技工业为主的国防经济供给部门；第二由从事军事活动的“纯军事单元”——军队为主体的需求（消费）部门。这种规范的根据是：只有存在需求与供给两个要素，并在实践中相互联系、相互交换和相互作用，才能真正构成一个经济运行系统。从供求关系的角度对国防经济进行的抽象不仅是本文研究的需要，也是符合实际的。

与上述定义相关联，国防经济以及国防经济的行为主体是可以分层次的。就全社会而言，存在着如何合理分割既有资源于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两大领域的问题；就保卫生产而言，存在着全体公众需要多高的“安全程度”，以及国防领域能够提供多少“安全产品”的问题；就军事生产而言，存在着武器装备生产者能否满足军事单元的军事活动需求的问题；等等。无论是在哪个层次上，所谓均衡最终都可表现为国防总需求与国防总供给之间的均等（同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